

# 从考古看明清山东海防

代生

近年来,北洋甲午沉舰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重要进展。2020年9月,定远舰重达18.7吨的铁甲在刘公岛起吊出水;2022年,靖远舰遗址第一期水下考古调查共发掘各类文物201件,通过发现的210毫米克虏伯炮弹验证了靖远舰的正身,此项工作入选“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与此同时,山东省启动“明清海防遗址考古调查”工作,全面调查和登记了所辖区域海防遗址543处,其中新发现168处。这些珍贵的遗址和文物,是中华民族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见证,它们向世人诉说着明清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悠悠往事。



这是停靠在威海湾的“定远纪念舰”。新华社记者 王阳 摄



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第一期调查项目在水下发现的一块属于“定远舰”的铁甲(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 (一)

元朝末年,日本国内诸侯割据,战乱不休,一些在战争中失败的日本武士、浪人等,出没于中国的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活动,被称为倭寇。明朝初年,倭寇主要在朝鲜沿海活动,并逐步向我国北方沿海延伸,山东成为倭寇活动的“重灾区”。为此,朱元璋在沿海建立了一套防卫机构和设施,并不断增加和完善,如卫所、巡检司,以及所辖的墩、堡或水城、水寨等等。卫是区域级最高级别的军事单位,有固定的防卫区域,有城池、城墙,屯驻重兵,兵民一体。所是次一级的军事单位,分布在沿海要害之地,归卫管辖。卫、所是海防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军事据点。所之下还有寨,是相对较小的兵营;还有巡检司负责巡弋海疆。这样的设置,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海防体制。洪武初年,原来只设登州卫和莱州卫,宁海为备御所,到了洪武十年,宁海升格为卫,并逐年加强。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山东沿海

防御体系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拱卫京畿的重要“国门”,登州海防的地位更加突出。明王朝为了进一步巩固海防,在登州设置备倭都司,总督山东沿海诸路兵马,统辖山东全省防倭事宜,并在沿海设置了“营”,作为都指挥使司和卫的中间军事指挥机构。当时共设置了3个营,即登州营、文登营和即墨营,3个营管辖山东24个卫所,营中设把总、指挥同知、指挥僉事等武职官员。把总为各营长官,与指挥同知、指挥僉事共同掌管总营事;又有20巡检司,243墩和129堡。可以说,由于朱元璋和朱棣等统治者的重视和经营,明朝北部海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除了建立海防系统,明成祖朱棣通过多种途径给日本政府施压控制倭寇,所以直到嘉靖中叶,倭寇只是零星来犯,未形成较大威胁。为了荡平倭寇,明代山东涌现一批著名将领和仁人志士。如抗倭名将戚继光,在25岁时即被任命为署都指挥僉事,上任之初,戚继光就开始整顿军纪,训练士兵,加强战斗力,同时裁撤不称职官员,提拔一批年轻有为的将领。与此同时,积极处

理民事案件,明察秋毫,秉公执法,得到了上下的认同。

戚继光在总督山东备倭期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军事训练、屯田生产和防倭设施的修建上;在沿海百姓中组织起民兵,保家卫国。他还全面考察所辖沿海卫所,每到一处都仔细检查防倭设备,及时维修,对官兵爱护有加,因此在他任职山东期间,山东的海防成为当时沿海各省份中最为牢固的防线之一。山东海防的牢固与江浙以东南沿海的“脆弱”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僉书,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他亲自编写《纪效新书》指导练兵,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修建空心敌台,改良军备,组织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抗倭军队——“戚家军”,为扫除沿海倭寇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戚继光外,还有一批抗倭将领、朝中大臣以及山东沿海州府官员,或直接参与经营海防,或朝奏皇帝重视海防建设,或提出具体的海防建议和部署,推动了山东的海防及抗倭活动取得一系列成就。

## (二)

清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的海防压力巨大,有内有外,如李自成将赵应元领导的青州起义,于七在登州地区领导的抗清斗争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一系列抗清活动,在沿海一带给清政府统治带来了极大威胁。而从康熙末年开,海盗逐渐兴起,他们在威海卫、灵山卫等区域滋扰,威胁着山东区域的海疆安全。此外,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海疆已是虎视眈眈。可以说,山东海防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唯有建立牢固的海疆体系,才能维护国家安全。

清王朝建立时沿袭了明代的卫所制度,其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废除了卫指挥使,将卫变为行政机构,卫所的性质趋近于州县,而到了雍正年间,开始大规模裁撤卫所,卫所的官员由原来的世袭制改为任命制,纳入兵部统一遴选任命。为了做好海防建设,清政府还另谋他法,积极扩建水师,增设战船,在战略要地建筑炮台,同时着手建立以绿营和八旗为主的水陆海防体系,实行禁海和迁界政策,来建立以海岸为依托、近海防御和海岸防御相结合的海防体系。

嘉庆以后,清代海防松弛,海防官员多不能尽职尽责,加之思想疲敝,设施落后,因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海上大门洞开,列强从海上横冲直入,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半殖民地时代。1894—1895年,清政府耗费巨资组建的北洋水师,却因政府腐败、内部倾轧等因素导致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等一批爱国将领英勇殉国。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列强侵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清政府所建立的海防体系已经形同虚设,濒临崩溃。甲午战争后,刘公岛落入侵略者手中,1895—1898年为日寇所占,此后至1930年又被英国强制租借,1937—1945年再次被日军占领,刘公岛成为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史的见证和缩影。一处处海防遗址,一件件出水文物,镌刻着中国抵御外侵的历史,也时刻警醒国人:弱国没有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转自《学习时报》)

## 白居易的槐花情

姜薇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都写过槐花,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是真的喜欢这素雅香甜的槐花,写下了十几首与槐花有关的诗歌。

或许,最为人知的是白居易《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中的这句:“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一个“落”字,满地洁白,恰如一夜雪飘扬,给人冰清玉洁、素雅静谧的感觉。但我更喜欢的却是《夏夜宿直》里的这句:“槐花满院气,松子落阶声。”诗人独自在空旷的院子里纳凉,此刻已入夜,凉风习习,空气格外清新,枝条上的露珠清澈欲滴,满院子静静地飘着槐花的清香,松子落在台阶上的声音格外清晰。一动一静,诗人的寂寥也如影随形。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的白居易写槐花的诗,都是他在宫廷内当值时的所见所感所思。

白居易钟情于槐花,将个人的许多情感寄托在这个意象上,写出了不一样的槐花。

白居易的早期经历十分坎坷,四处漂泊。贞元十九年(803)春,白居易在长安登拔萃科,授校书郎。校书郎的工作虽然清闲,但在长安举目无亲,不免感到孤独寂寞。在一个炎热的夏日,诗人动了思乡之情,于是写下了《思归》,其中有这样几句:“悠悠乡关路,梦去身不随。坐惜时节变,蝉鸣槐花枝。”诗人希望能够用自己微薄的俸禄来奉养亲人,但“薄俸未及亲,别家已经时”,自己别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愧疚没有尽到奉亲的责任。听到蝉在槐花枝上不停鸣叫,诗人不由得感叹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冬去春来,而今春去已是夏,自己孤身一人在京城,思乡而又无法归乡。

除了表露对故乡的怀念,白居易几次被贬,无处实现自己的志向,他许多写槐花的诗歌,也表露出对自身遭遇的

伤怀和对人生的思考。在农历六月上旬的一日,白居易写下一首《早蝉》:“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楠深叶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殊未起,秋思先秋生。忆昔在东掖,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湓城。”蝉声依旧,只是白居易听到蝉声的地方已不同,如今是在江边的树下,而往昔是在宫中的槐树下。这蝉声催出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夏季才刚刚开始,西风未起,而秋思已浓;这蝉声也催出了诗人的落寞之意,由京城到湓城,心中的郁闷到底不是那么容易排解的。

湓城,故址在今江西九江,因此《早蝉》一诗写于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时期。仕途上的挫折,加之母亲的离世,让他身心俱疲。对于白居易,这是一段难过的日子,诗人的不幸却往往孕育出绝世的佳作。正是在此时,白居易创作出《琵琶行》,江州司马的青衫湿了,后世读者的眼眶也湿了。

新蝉啼鸣,槐花初放,是初夏时节的典型特点,将蝉声与槐花结合在一起,白居易用过许多次。“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白发生头速,青云入手迟。无过一杯酒,相劝数开眉。”这是白居易的《闻新蝉赠刘二十八》,槐花刚刚绽放,蝉刚刚鸣叫,时光催人老,如今白发越来越多,而事业却未有起色,惆怅是有的,感伤也是有的,但白居易已经历练到了能以杯酒释怀的境地。还是要坦然面对才是,诗中虽有哀愁,却也表达了作者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诗人因不同的人生境遇、不同的情绪,赋予槐花不同的情愫。槐花的花语是脱尘出俗,就像白居易的槐花诗,自其诞生已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如今品来,依旧清新脱俗,依然能在今天读者的心中激荡起涟漪,或许再闻槐花香,亦能体会到白居易的槐花情。

(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